

受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影响情境下的经济可持续性理论

冯刚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 青岛 266071, 山东, 中国

摘要: 本文旨在考察当发展路径背离了对自然影响极小的恒定而有节制的增长轨道之后, 所出现的困境与异常问题。因为任何替代方案实际上都是徒劳的: 这种替代方案事实上就是坠入所谓的“亚世界”, 在其中恒定的发展路线被经济周期所裹挟, 并表现为受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支配。然而, “祸兮福之所倚”。亚世界的这些异常现象绝非攻击性的工具, 而毋宁是一种治疗手段——只要我们不笨拙地阻挠其显现。因此, 对这些异常现象(首先是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任何抵抗, 都可能要为其滞留于经济场景之中所造成的日益加深的病痛负责。所以, 不愿承受为走出亚世界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困扰世界长达二十年之久的通货膨胀的成因。更糟糕的是, 恶性通货膨胀占据了经济舞台, 而人们随后又试图以货币流通量的异常增加来对抗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都是需要付出牺牲(休养期)才能摆脱货币病痛的治疗手段。即便是通货紧缩这一必须视为危险疾病的现象, 若被忽视, 也无法通过以超凯恩斯主义手段与增加流动性为基础的惯常“大杂烩”来解决。这不仅不是应对问题的正确方式, 而且我们还会严重面临日本式综合征的风险——该国与通货紧缩搏斗了二十年而未获成功。真正能够使我们重返对自然损害最小的恒定增长路径的疗法, 恰恰是简单地遵循自然的安排: 它要求一次哪怕是艰难的衰退转向, 以真正开启问题的解决。因为无论是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 都是自然发出的信息, 警示共同体经济状况正在恶化, 必须尽快改变方向, 哪怕需要经历一场严重的衰退。

关键词: 通货紧缩; 作为治疗手段的经济周期; 投机; 低利率

The Theory of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in a Scenario Influenced by Inflation or Deflation

Gang 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is work aims to examine the issue of troubles and anomalies that affect the development path when it has abandoned the regular path of a constant and contained growth with minimal impact on nature. Because any alternative is indeed fruitless; the alternative, in fact, is the fall into the so-called sub-world, in which the constant line of development is caught in the conjuncture cycle and appears taken by inflation or deflation. Nevertheless,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Indeed, these anomalies of the sub-world are by no means offensive instruments but rather a

kind of cure, if we do not awkwardly oppose their manifestation. Thus, any resistance to these anomalies, starting from inflation and deflation, may then be responsible for the growing malaise produced by their permanence within the economic scenario. Therefore, not accepting the penalties to be paid in order to leave the sub-world was the cause of the twenty-year inflation that afflicted the world during the 60s and 70s of the last century. But worse than that, the hyperinflation has occupied the economic scenario and then attempts were made to fight inflation with an abnormal increase of money circulation. Inflation and deflation are care treatments requiring a sacrifice (convalescence) to be released from monetary malaise. Even deflation, which we must consider a dangerous disease, if neglected cannot be solved through the usual melting pot based on hyper-Keynesian actions and increased liquidity. Not only this isn't the right way to face the problem, but we seriously risk the syndrome that affected Japan, which has been fighting deflation for twenty years without success. The cure that can put us back on the path of constant growth with minimal damage to nature, is instead to simply follow the natural settings that ask for a recessionary turn, even hard, to really start the solution. Because both deflation and inflation are natural messages that warn the community that things in the economy are going badly and a direction change is needed soon, even going through a severe recession. The community is the referent of natural world on the issue of life survival on the planet and a good government should listen to its community, without looking for alternative and wrong escape routes.

Keywords: Deflation; Conjuncture cycle as a cure; Speculation; Low interest rates

一、引言

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苦苦搏斗的经济体系，遗憾地正是当下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的现实处境。货币变动的意外扩散在公众中引发了极大的困惑与忧虑。价格体系如旋转木马般起落当然并非新鲜事。然而新的情况在于，全球性的货币异常正不可阻挡地滑向通货紧缩的漩涡。隐藏在价格下跌现象背后的负面能量，似乎并未逃过我们各共同体的注意。然而遗憾的是，类似而对等的关注在政治圈与制度层面却无处安放：它们在通货膨胀出现时高度警惕，对价格下跌却不那么上心。

然而，失衡经济的这两位“婢女”（即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是发展道路上失衡状况的迅捷先兆，正因如此，它们本应成为快速干预的对象，以防止货币现象的蔓延。但首先，为什么把这些异常称作“婢女”？因为好的仆从会追随其主人，并准确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而通货膨胀继而通货紧缩，正是受自然界“普适常数”所支配的实体。这是一个有待商榷的论断，但确乎并非不可能 [1]。由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所触发的价格变动，是经济管理失误的结果。以至于共同体出于对家庭收入所受负面影响的忧虑，正在增强其对当权领导层的批判意识。这种反应在民主政体下与在其他政体类型下的情形并无二致。因为政府是负责依据（在民主国家中）共同体多数派的投票指示来管理经济的技术与行政构件。这种权力在其他政体类型中有所减弱，但并未完全消失。这就等于说，经济方案中的管理失误因而落入共同体的（间接）责任范围。共同体的任务不仅是对现状表达异议，还要支持一条新的方案路线。

因此我们可以说，政府是发展道路上权力管理的技术之手，但共同体或者说其多数派，始终是恒定的经典发展路径以及对环境损害较小的发展路径上无可争议的中心 [2]。所以毫无疑问，经济周期与货币异常对于共同体而言具有症候的价值：它们表明必须改变经济的方向。

现在让我们把话说清楚。经济周期是经济发展进程线上的一道弯曲，它与自然增长那种恒定而受控的发展相抵触。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按照适用于经济的人择原理，人类与支撑我们生存的自然界拥有共同的目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存续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这种相互共生的关系中成为自然系统发展的伙伴：因而经济发展与知识追求便成为人类为在地球上生存所遵循的理由与规则。

那么我这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从经济上说，这可能意味着我们正在并且已经采取了与自然趋势相抵触的立场。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而违背自然的立场，当我们脱离我们称之为经典的发展线时，它可能使整个共同体面临可能浮现的潜在悲剧 [3]。因此，我们称之为亚世界的那个替代方案，正是我们一旦或当我们脱离自然发展路径时所进入的区域。需要澄清一点：我们已认定为经济周期婢女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无论如何都不是把我们引向亚世界地狱的某种邪恶机制的组成部分。相反，它们是保护性工具，也是发给共同体的重要信息。之所以说是保护，是因为如果我们遵循导向接受一场“净化性”衰退的自然指示，我们就能帮助经济体系走出货币异常的危险漩涡。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是传达给共同体的信息，用以告知或确认经济状况不佳，因而经济管理需要作出纠正。

如今，共同体的多数派应当被视为自然界的对话对象，即人类中承接自然信息、进而能够解读其关于经济状态之含义的那一部分。但还不止于此 [4]。关于经济正在偏离自然路径这一方向性的信息，可以是显性的（例如经济景气状况与货币异常），也可以是隐性的 [5]。在第二类之中，我们可以纳入我们所有人共同拥有的那些感受，它们同样在预先警示我们经济的未来走向。因此我们应当反思：始终是共同体先于显性信息作出判断，决定它是否相信经济在未来会好转还是恶化。在此之后，我们才会看到景气状况可能出现的种种变化，而那不过是显而易见的后果。

由此可见，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应被解读为对统治者的警示，要求其遵从共同体的意见——共同体断然敌视货币变动，并要求建立必要的防线。另一方面，当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出现在经济场景之中时，经济所应采取的方向本应毫不含糊地指向衰退。衰退应被理解为对抗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进而避免其毁灭性滞留的绝对而相对的补救手段。

这就等于说，在经济世界中，人类及其制度并非孤立无援，而是在其面前摆着一条为避免最坏结果所应遵循的清晰指示。此外，因通胀或通缩价格的意外压力而在共同体内部产生的异见，始终朝着同一方向移动，也就是说，它遵循着转向衰退的周期曲线 [6]。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衰退是主要的也是唯一的道路——从社会角度看当然是沉重而昂贵的道路——它能够带领我们走出亚世界那充满种种意外幽灵的漩涡。今日承担一份代价，进而拥有实现经济重新平衡复苏的力量。

当然，我们并未被囚禁在笼中，我们的自主性始终受到保障。因此，一个治理不善的政府和一个分裂为诸多提出各式主张之群体的共同体，始终有可能逆流而上，冲破那道界定并标示正确路径的墙 [7]。否则我们又该如何解释上世纪前后两个半叶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呢？当时出现了广泛的通货膨胀现象以及极其令人不安的恶性通货膨胀，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恶性通胀，随后是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津巴布韦等等，更不用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全球性通货膨胀。

举一个例子，我想回顾一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早在战争仍在进行之时，通货膨胀就开始上升，因为该国必须承担可观的战争成本，为此在赢得战争、进而让战败国偿付所有累积债务的希望与确信之下，印制了巨量的货币。他们确信必胜，但事实并非如此：德国输掉了战争，并被迫签署一项和约，其中包括向战胜国支付巨额战争损害赔偿；此外，该条约还规定将整座工业设施移交给法国与英国，并割让部分拥有可观煤铁矿藏的德国领土。为应对不断增长的债务，该国继续发行新的货币，货币购买力的丧失变得势不可挡。举例来说，我们不妨回顾：购买一公斤面包需要 4000 亿马克！最近发生在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货膨胀案例与此颇为相似。

那么，这一切究竟何以可能，又为何会发生？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形下，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人们顽固地一再试图以不间断发行新货币的方式来支撑下行的经济周期 [8]。持续发行新货币的过程不仅无助于实体经

济，反而以废纸般的货币淹没了市场。通货膨胀表现为名义通胀率的加速，而这取决于该国经济失衡的状态。加速是通货膨胀的一项特征。就像池塘中的气泡一样，不断扩大的价格波纹会按照初始加速度所设定的节奏扩张。因此，在现象演进的过程中，价格的节奏始终保持着相对于经济动态的准独立性。

（一）亚世界的两位婢女无法被操纵，它们无论如何都是必须警示共同体的信息

那么，这一切究竟何以可能，又为何会发生？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形下，这种情况之所以常常发生，是因为人们固执而反复地试图使下行的经济周期继续维持下去。持续发行新货币的过程不仅无助于实体经济，反而以贬值的货币淹没了市场。请考虑：通货膨胀表现为名义通胀率的加速，而这取决于该国经济失衡的状态。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而言，一路通向纸币化的恶性通胀导火索，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的严峻经济状况——它已经饱受极高的负向加速度之苦。加速推力是通货膨胀的典型属性，在现象发生之初它被激活，并依据经济的不稳定状态加以衡量。随后，正如池塘中的气泡一样，价格的上行波动会按照初始加速度所设定的节奏扩张。然而，在现象演进的过程中，价格的节奏始终独立于经济动态。因此，一旦再度诉诸新的纸币发行，价格的节奏就可能继续加速。

那么，在我们所考察的案例中，为什么通货膨胀率的扩张会加速到荒谬的程度？在缺乏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这一基本因素（即通货膨胀的加速率）并不会改变。那么，为什么德国的通货膨胀会如此急剧地提速？原因在于通货膨胀所特有的两种现象。在无限量发行货币的情况下，初始加速度可能被改变，直至演变为迅猛的暴增。为什么？这种增长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些条件下，“费雪模型”即货币数量论开始适用。按照该理论：

$$P = M \times V / T \quad (1)$$

也就是说，价格 P 由 M （货币流通量）乘以 V （流通速度）再除以 T （交易商品量）之比给出。换言之，货币流通量的无限增加似乎能够无休止地加快通货膨胀率。

尽管如此，费雪模型是建立在难以接受的假设之上的。然而，抛开该公式结论的有效性不谈，事实依然是：恶性通货膨胀期间过量的货币会成为助燃剂，推动一场只有在最终放弃纸币时才会结束的无尽狂奔。

然而众所周知，不可能通过增加货币在一个体系中制造出通货膨胀，正如不可能通过增加市场上的货币来制造通货膨胀以对冲通货紧缩一样。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这两位经济周期的婢女，本质上是经济学中普适常数这一自然体系所发出的信息——同时它们也是灾祸——它们无法凭任何经济政策或货币政策的意愿被随意触发。通货膨胀随流通货币量过度而加速的这一独特倾向，似乎可以由市场上巨量货币所具有的同时性与并行性来解释。简言之，这些是相互竞争的因素，它们超过某一限度之后便会介入，改变加速度这一初始的特征常数。这一被称为货币数量论的规则，如果能够适用于通货紧缩的情形，反而会成为一对立的行动者。届时它将产生抵消通货紧缩之信息的效果。这一假设被两种异常（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本性所否定：它们根本不相互矛盾，而只是信息的载体。在通货紧缩的情形下，该理论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否定：新货币的发行对实体经济没有影响或影响甚微。亚世界的两位婢女无法被操纵，它们无论如何都是必须发挥作用、警示共同体在经济道路上所采取方向有误的信息。两位婢女这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使我们相信，我们所面对的是不容许有替代方案的经济法则，因为它们的首要目的是就经济问题——也就是人类的存续问题——向集体发出警报。而在这一具体情形下，其目标是通过吸引共同体的注意来避免经济机制的崩溃，因为共同体对当代与后代的生命负有责任。

二、研究方法

（一）货币异常因而是一种治疗手段，供经济管理者用以避免不可挽回的损害

换言之，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都是重振拥堵经济的工具。因此，试图使二者相互对抗（通胀对通缩）是毫

无意义的。既然二者事实上都是治疗失衡体系的工具，那么——单纯依照逻辑——就不容许它们能够相互抵消。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掌握其产生与形成的过程；因此，我们应当克制任何随心所欲地使用它们的企图。

所以，它们是一种治疗手段，供经济管理者用以避免不可挽回的损害。这显然是好事。但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来自亚世界的“幽灵”即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之间会存在两种干预的可能。由于自然干预所具有的节制原则，必须假定存在着依据某一经济体系失衡状态而施用的不同疗法。无论如何，它们是不同的疗法，无法相互抵消。但它们为何以及如何被施用？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通货膨胀在全球范围内明显占据上风，直到通货膨胀最终在多数大国所发动的这场战役中败下阵来。经过这段艰难时期之后，九十年代迎来了一段全球发展期：全球格局已经改变。警钟由 2008—2009 年的严重金融危机敲响，此前住宅领域（次贷危机与房地产市场）曾出现广泛的投机浪潮。这场危机与投机泡沫为全球经济带来了通货紧缩。

为什么全球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屈服于通货膨胀，并且此后肆虐了二十多年？多少具有解释力的一点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一次与第二次石油冲击爆发之后，主要国家的价格压力升至两位数。价格快速加速的原因，对于恶性通货膨胀事件与七十年代的全球通货膨胀而言似乎是相同的。概言之，决定诉诸公共赤字支出以部分吸收黑金价格的异常上涨，可能正是七十年代通货膨胀加速的原因。我们认为，在通货膨胀的情形下，任何试图通过公共赤字支出来支撑周期并修正通货膨胀率的行动都会受到严厉惩罚。原因始终在于：当人们决定逆周期的自然趋势而行时，经济体系所作出的反应。事实上，在通货膨胀的情形下，为纠正通胀体系的不稳定，货币政策会诉诸提高利率以跟上贬值货币的价值损失。这一操作会促使经济体系走向衰退，而衰退是可用于纠正经济偏航、试图重返对自然界损害最小之恒定增长路径的唯一工具。

通货膨胀是一个阻断经济发展的陷阱，在惰性行为或与自然方向（衰退）背道而驰的行为之下，它还会加剧自身的钳制。那么现在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以及出于什么充分的理由，世界自世纪之交以来陷入了通货紧缩的领域；以及为什么它并未像上个世纪那样遭受价格的加速狂奔，而是遭遇了表面上相反的、价格渐进自我下降的现象。两种现象都是经济周期的婢女，但客观上颇为不同：一者价格加速，一者价格减速。既然激活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自然体系所追求的目标是通过逐步重建经典而恒定的自然状态来实施治疗，那么就可以排除这两种不同的“疗法”是无差别地、几乎随机地起作用的。相反，我们必须承认，它们是依据经济所面临的困难而登上经济舞台的。我们应当摒弃无差别行动的假设，因为那是一种经过精心校准的选择。那么，由谁来决定和调控呢？

我们可以假定，这些选择是由作用于物理与物质世界的普适常数群中某些普适的经济常数所“决定”的。为了确保人类的存续，自然体系所提供的各种选项没有一项是听凭偶然的。相反，其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引，它监护着人类的存续，因而会采取行动以避免经济场景发生不可逆转的坠落。基于这一假设，出于什么理由可以预测不久的将来会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呢？

与此同时，有必要确认的是：无论我们选择哪一处炼狱，留下的唯一确定性是，我们已经偏离了那条对自然损害最小的线性而恒定的路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出现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坠入亚世界，尽管危险程度如何尚待观察。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社会病痛的初始阶段，即当人们走出以有节制之倾向（发展节奏）为特征的恒定增长阶段，继而进入经济周期漩涡之时。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可以引导我们“放任自流”、以耐心与担当遵循自然趋势所指路径的信号，而这一趋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受到阻挠。

因此，如果我们不幸在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目睹了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出现，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当前的周期已经恶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采取措施以防止现象进一步恶化。因而，警报之所以变得

严重，是由于经济周期与货币异常的联合出现。此时或许应当指出，战后一代不得不面对通货膨胀问题，并且在二十多年之后才摆脱困境。为名义价格上涨敞开大门的原因，是许多西方国家所经历的加速发展长波的终结。这是持续了大约二十年的加速发展周期不可避免的放缓。遗憾的是，我们当时的统治者认为可以强行推动正在放缓的经济而不承担后果。但后果就是长达二十年的全球通货膨胀。

现在我们可以说，试图强行推动业已耗尽的经济周期，正是坠入亚世界平均水平的成因——而那当然不是一个容易摆脱困境的处境。然而，许多欧洲国家政府为试图以公共支出支撑经济而反复进行的干预，使困难变得更加复杂，从而加速了通货膨胀进程的初始动能。

因此，通货膨胀可以被置于坠入亚世界的早期阶段。但在进一步展开之前，我们必须说明：亚世界是一处炼狱，其中经济发展即便未被完全阻断，至少也受到了阻碍。然而，它也必须被看作一个可以从中跃回正常状态的平台，其特征是沿着稳定增长且对环境损害最小的路线恢复发展。我们所要支持的论点是：即便在亚世界的负面阶段中，也可能存在程度或大或小的失衡，因而需要各式各样的自然运作工具以避免戏剧性的不可逆坠落。

还应指出的是，在最近的经验中，我们并未出现经济体系无法挽回崩溃的事例，而我们确实拥有经济复原的事例——它们成功克服了极其严重的困难。这当然意味着，在金融异常的风暴之后，并不存在绝对报应的深渊，而毋宁是一次走出经济负面漩涡的机会，从而使经济能够在发展潜力的框架内重启其发展。

（二）通货紧缩可能带来等待复苏的疲弱实体经济与股市及资产价值上涨之间的异常鸿沟

我们可以假定，通货紧缩可能是坠入亚世界的最深阶段。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更难以恢复的坠落点，因而可能需要付出更大的牺牲才能摆脱困境。那么，我们凭什么说一个经济体系坠入通货紧缩可以被视为其坠落的极点？首先，让我们比较一下货币政策通常分别用于弥补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所造成损害的疗法。我们说过，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全球通货膨胀持续了二十多年才找到正确的疗法。对抗通货膨胀的制胜行动由 1979 年上任的保罗·沃尔克担任主席时期的美国货币政策所完成。沃尔克的决定在当时格外富有勇气。事实上，在罗纳德·里根总统的支持下，这位美联储掌门人决定将当时已超过 15% 的美国通货膨胀率提高数个百分点。结果，美国随之出现了持续数年的衰退，工业界发出了强烈抗议。但最终，通货膨胀在 1983 年回落至 3.5%，随后又降至 2%，并在此后十年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

由此可见，走出通货膨胀陷阱是有出路的，而且出路始终如一，也就是利用衰退——哪怕是特意引发的衰退——来击败通货膨胀，前提是这一措施足够强力且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吸收价格上涨的过剩部分。请注意，沃尔克的方案不仅足以吸收美国的价格过剩，还保证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没有价格上涨梦魇的时期。同样的思路，只是在某种意义上被反转过来，也曾被用来对抗通货紧缩，却未见成效。为应对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通货紧缩危险，各主要中央银行决定逐步将利率降至零甚至更低，也就是跟随价格体系的下跌，甚至提前一步把利率降到零以下。换言之，利率的下调超前于并超出了通货紧缩所施加的价格跌幅。极低或零成本的货币随后并未帮助市场，市场依然疲弱平淡。然而与此同时，一个被忽视和低估的危险被推到了台前：投机。

对抗通货紧缩的战役仍在茫茫大海之上，我们远未找到解药。因此，正如我们所见，通货紧缩的危险不仅依然存在，我们还有可能长期与这位令人不适的旅伴同行。这是解释为什么通货紧缩之灾是亚世界中最糟糕处境之一的第一个理由。

但让我们继续前行，试着找出使一个失衡的经济体系坠入亚世界的原因。那么，有必要回顾一下把全球经济带入 2008—2010 年严重金融危机的那场麻烦，这场危机波及了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通货膨胀的间歇期之后，总体状况自 2000 年代第一个十年起明显恶化，因为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普遍的通货紧缩趋势。

这种状况多少难以解读，因为表象看上去不错。此外，一切都被资产价值与股市的上涨所遮蔽，而经济本身依然疲弱。在这一切之中大踏步前进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房地产巨大投机热潮，以及由廉价货币所导致的一种奇特的麻醉状态。

简言之，房地产与股市价格一飞冲天，但与此同时，投机推高了石油价格，在第一个十年里达到并超过了每桶 80 美元。然而，日常购买的商品价格依然低迷，只是部分地受到能源成本上涨的影响。这是一种真正的普遍麻醉：由石油价格急剧上涨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反而被价格通缩所“掩盖”。这一表面上几近良好的场景，甚至使当时的各中央银行对不断增长的投机也保持了某种不温不火的态度。2007 年，在投机进程的顶峰时期，美国的消费价格勉强触及 3%，从而给人以一切安好的错觉。

因此，这是一种应归因于通货紧缩氛围的麻醉效应，它助长了前景的扭曲，促使投机者在无尽发展的希望中做梦。与此同时，未被卷入投机长流的市场所呈现的表面平静，也有助于让大批经营者、家庭与劳动者对可疑的经济现状感到安心。直到 2008 年的严重金融危机将其惊醒。遗憾的是，亚世界的深处充满了意料之外的现象、幻象与不确定性。凡此种种都表明，通货紧缩极其危险，而且当然远比通货膨胀更危险——后者并不制造幻象或荒谬的希望。

但通货紧缩这一危险的传奇并未就此终结，因为它无论如何都可能成为“麻醉性投机”现象与所有未被卷入之经济部门中平静却虚假之氛围反复上演的主角。换言之，如果我们任其自由行动，“投机性麻醉”就会接连重演，对经济产生有害影响：经济在投机形成的过程中保持惰性，却被始终严重的金融危机的负面效应全面吞噬。事实上，就在 2008—2010 年严重衰退之后仅仅几年，股票与金融资产价格的加速便再度启动。历史重演了。

图 1 显示了 2020—2022 年期间纽约主要证券交易所的表现。因此，在全球新冠疫情发展的时期，道琼斯指数表现出股票价值上涨的强劲趋势，尽管当时整个世界都在与疫情搏斗，封控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实施，生产与经济陷入停滞。这一异常现象所幸在 2020 年晚春被遏止，当时封控的普遍化促使投机者选择观望，这一点从同年春季纽约主要证券交易所指数所录得的大幅下跌中即可看出。尽管遭遇这一挫折，道琼斯指数随后又恢复上行并创出新高，但在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再度回落。



Figure 1 Trend of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Jan. 2020 - Nov. 2022

图 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走势（2020 年 1 月—2022 年 11 月）

来源：MarketWatch

在长期通货紧缩的情形下，货币政策的角色同样依然充满问题。如前所述，让利率的下跌先于价格体系的下跌，并未对实体经济产生预期的效果，实体经济无论如何仍处于不确定之中。与此同时，投机之路却因可以获得成本接近于零的廉价信贷而变得畅通。共同体与良好治理对通货紧缩之退化的回应始终如一：让自然的经济趋势顺其自然地走完全程，容忍国内生产总值的收缩，直到能够确认通货紧缩的钳制得到有效缓解为止。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终结那些惯常的陈词滥调。疫情期间，2020 年因卫生问题而实施的普遍封控导致全球发展急剧减少。因此，疫情所强加的行为符合衰退的要求，而不是自然趋势所要求的行为。抗病毒的推广重新启动了经济，经济在 2021 年下半年已显示出强劲复苏的迹象。面对增长而强劲的需求，许多中间工业产品供给的滞后助推了价格紧张，尤其是能源价格的亢奋。然而，结果几乎出人意料，因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副作用：通货紧缩的缓解。不过这并不奇怪，因为经济周期的急剧下行之后可能出现价格体系的下跌（通货紧缩）；反之，经济的急剧改善会缓解通货紧缩的钳制。因此在西方世界，日常产品的价格在生产成本上升的推动下，没有再遇到通货紧缩所提供的抵抗。通货紧缩正在退却。

这对生活成本而言是一种不利，尤其对最贫困的家庭而言，但从重获正常安宁的角度看，对全球经济而言则是一个好兆头。当然，各中央银行传统的反通胀操作提高了信贷成本，遏制了投机的陷阱。请允许我指出，我们当前所经历的通货膨胀并非六七十年代那次通胀的简单重演。如今逐步影响生产与贸易的，是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的效应；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反而在控制投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相反，我们认为上个世纪美国与欧洲所遭受的通货膨胀，是对强行推动经济增长之种种尝试的自然回应——而那种增长在二战后的发展冲刺之后已经耗尽。

（三）遗憾的是，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收入会向更为优越的阶层转移；各大洲区域注定趋向某种程度的一致

对上述问题最新事态的这一简要梳理，为我们提供了作出若干重要澄清的出发点。首先，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长期陷于通货紧缩之中的经济所面临的最重要危险。我所说的是那个始终迫在眉睫的危险：在停滞而无力的实体经济与相反的、可能上涨的股市与股权资产之间，可能出现一道鸿沟，从而使真实价值远离由投机压力所造就的人为价值。在这一场景中，货币政策通常会以把利率降至零甚至零以下为目标。这是一种可以用廉价货币的可得性来助长投机之火的政策行动。而它在实体经济中却无法取得同样的成功——实体经济承受着压力，因而无法从信贷的可得性中获益。我们可以补充说，在这一场景中，普遍流行的观念是股市的稳定与活跃是给经济复苏以推动的可靠途径。遗憾的是，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因此，我们必须把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视为发给共同体的紧急信息：共同体应当毫不迟疑地向政府表达其深切的异议，以改变行为方式并回到对自然损害最小的稳定发展路线。在上述简要勾勒的负面场景之外，我们还要补充：通货紧缩（以及通货膨胀）不利于共同体内部财富与收入的正确分配。事实上，二者——如果并且当被放任自由行动时——都会降低较不受益人群的工资与养老金价值，从而使收入向更为优越的阶层转移。通货紧缩的作用似乎正在于此：通过扩大财富的价值并减少制造业岗位，最终的结果将是收入从社会最贫困的部分向大宗地产所有者的不公平转移。

还有一段插曲值得分析。自 2020 年起漫长而出人意外的疫情在全球范围内阻断了发展。因此，在至少一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发展潜力被遏制传染扩散的努力所瘫痪。正如我们所见，在大规模疫苗接种带来复苏之后，总体经济也出现了强劲的复苏。这是为什么？

必须承认，按照自然趋势，各大洲的经济发展水平会随时间趋于一致。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福祉状况、知识与文明水平的差异，源于气候与社会条件。但各大洲区域的演化趋势注定会趋向某种程度的一致，理由很简单，

就是一种自然的理由。否则又该如何解释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中依循一种前所未有的进程所实现的惊人跃升。帝国时代所达到的文明与财富水平，尤其是前几代人对文化与学问的重视所可能作出的贡献，当然应当加以考虑。所有这些要素或许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当然不是以决定性的方式，来解释上世纪下半叶发展的惊人加速。那么该如何解释呢？毫无疑问，我们如今正走向各区域与各大洲总体状况逐步趋近的前景。我们现在应当预期非洲有可能出现即将到来的发展加速——非洲是世界上加速发展的新路线。随着此前主要指向亚洲大陆两个大国即中国与印度的全球化的松动，如今相关前提似乎已经具备，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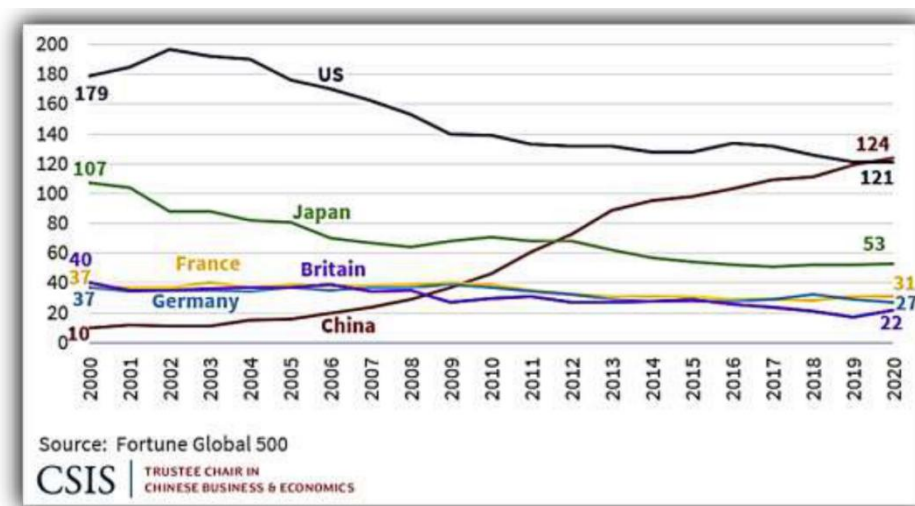


Figure 2 Comparis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s in Some Countries 2000 - 2020

图 2 部分国家经济发展趋势比较（2000—2020 年）

来源：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整理

换言之，即便是这种蕴藏在长期凝固、增长受阻之过去中的可能性，似乎也是在自然趋势的许可之下被激活的，而自然趋势又取决于环境状态与全球经济格局。

话虽如此，可以合理地认为，西方世界近几个月来正在进行的复苏似乎与疫情所强加的漫长封控有关，并且在未来两三年内几乎不会放缓，即便欧洲的状况因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而变得复杂。此外，某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与欧洲即将在 2023 年迎来衰退的观点，似乎并不可取。这一假设基于经济周期可预测交替的论点。首先，经济节奏只有在恒定发展且对自然损害最小的经典情形下才是可预测的；否则它远非可以预测。经济周期具有实质性不确定性的原因，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周期的心律不齐取决于施用于失衡体系的自然疗法。事实上，经济周期在一个经济体系的场景中出现，是作为回归对环境损害最小之恒定增长的工具。因此，它既受体系失衡状态的影响，也受经济政策与货币政策所施加干预的影响。基本上，当加速复苏阶段在发展悬置期之后出现时，逆向经济周期同时与复苏相重叠的假设显得不太可能。

美国与欧洲正在进行的发展节奏复苏，似乎与持续了大约一年（尽管断断续续）的活动封控有关。在那段时间里，大气状况明显改善，生产的迅速减少导致人类活动所产生、自然难以代谢的废弃物下降。因此，我们对环境产生了尤为积极的双重效应，而环境通常会以一段意料之外的经济复兴作为回报——这段时期的长短大概取决于所给予自然环境的好处大小。在这种情形下，与前述内容相比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规则始终如一：衰退是人类与自然之间艰难关系唯一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完全可以把生产活动的疫情封控与自然经济周期所带来的衰退相类比。因此在这种情形下，疫情所强加的经济活动长期停摆对家庭与企业而言是一种损害，但对自然为中和我们在这颗星球上的存在所造成的损害而持续付出的努力而言，则是一种助益。

三、研究结果

（一）近期日本经济的境遇与加速

如前所述，经济周期的异常完全不具恒常性，且无论如何都取决于经济状况，它们可能因对加速进程的考察而引发强烈的联想。数百年来，亚洲的这些加速进程呈现出多种面貌。除了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加速发展道路上奔跑约半个世纪这一最新案例之外，同样在亚洲还有其他案例，如 1592 年与 1868 年的日本。

日本新的军事、民事与经济实力随后在上个世纪的两次重大场合中显现：旭日之国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战争——它需要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干预以避免沙皇帝国的灾难性崩溃——以及最后对珍珠港的袭击。中国的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毛泽东逝世之后则不那么具有戏剧性，因为该国得以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加快发展步伐，且这一速度至少持续了四十年，使中国跃升为亚洲第一大强国、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强国。

在简要提及这些在经济、科学乃至军事实力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加速事例之后，可以推演出若干独特的结论。总体而言，在漫长的发展悬置期与发展加速的扩展阶段真正启动之间，并不存在连续性。加速阶段通常绝不会紧随一个地区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苦苦搏斗的时期之后。不过，这种可能性的发生似乎要求经济形势有所改善，从而导致货币变动现象的消退。我们刚刚在最近几个月经历了后一种情形：西方世界的经济复苏以通货紧缩钳制的减弱为标志。

发展悬置阶段与加速复苏阶段之间的不连续，曾出现在 1980 年及此后数年的意大利。“美丽之国”的货币政策曾比照美联储及其主席保罗·阿道夫·沃尔克所引入的制胜手法而行动。基本上，“沃尔克法则”就是把利率提高到通货膨胀率之上数百个百分点。当时意大利的通货膨胀率超过 20%，而意大利银行的决定则不那么激进，以避免体系在通货膨胀所施加的长期“窒息”之后陷入严重衰退。但那种谨慎的做法是一个错误，因为结果并非预期中的通货膨胀崩塌，而是价格奔跑的缓慢回落——直到八十年代末仍高于 5%。此外，意大利并未出现美国那样十年的优异经济成绩，其经济表现反而依旧疲弱。因此，不仅通货膨胀持续十多年保持在 5% 以上，而且在通货膨胀节奏长期放缓之后，预期中的经济周期改善也并未出现。这印证了这样一点：在丧失的潜能与可能复苏的时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连续性。

但可以介入发展潜能加速重启的因素有若干种。让我们看看 1980 年意大利所发生的情况：预期中的经济反弹并未出现，因为经济仍在与通货膨胀搏斗，并且此后又持续了十年。另一方面，正如我们随后将会看到的，由于亚平宁半岛（即意大利）同样出现了意料之外的通货紧缩，令人不满的经济成绩在 2000 年代第一个十年仍在延续，潜能进一步陷于停滞。

如果我们把意大利在高通胀时期所遭受的这一落差与美国经济作一比较，就不应对此感到意外：意大利因八十年代乃至部分九十年代通货膨胀的高度持续而受到惩罚，而后者（美国）则在同一时期因价格竞争的明显减弱而获得回报。经济走势严格地掌握在共同体手中，有利或不利的情绪正是在共同体中前瞻性地形成的。现在已经相当清楚：在八十年代初美国严重衰退之后，通货膨胀的下降受到了共同体的高度欢迎，因而对未来抱有良好的预期。

反观意大利，通货膨胀在整个八十年代乃至更长时期内的持续，冻结了一切发展前景，这也与该国共同体所表达的普遍失望有关。认为政府能够通过支持经济的措施改变共同体所表达之不确定预期的幻象，不过是一种毫无希望的空想。政府的主要任务不应当是缓和弥漫于共同体中的悲观情绪——这种悲观源于经济景气及其货币变动所标示的种种失误。相反，良好的治理应当努力缓和影响民众权利的种种差别，因为群体之间的团结与经济前景的改善取决于权利平等这一领域。尤为重要的是，首要任务是不要试图通过额外的方案与项目去干

预人们的情绪，因为人们的预期只有在共同体情绪好转时才可能改善，而这要从一个更为稳定的价格体系开始。

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预期意大利会迎来一段前景良好的时期？因为今天我们正目睹通货紧缩钳制的减弱，以及该国许多部门预期的复苏，首先是工业与出口。终于，在长期的禁戒之后，通货紧缩正在退却，并且可能进一步退却。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正在下降而非加速，且源于石油与能源投机的部分正在消退。这令人希望当前的势头能够延续下去，因为该国在长期通货膨胀在前、2000 年以来通货紧缩在后的双重打击之下，已经承受了至少三十年的停滞。

事实上，我们不要忘记，良好的治理首先与公民的同意联系在一起。遗憾的是，长期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搏斗的意大利，已经积累了富人与穷人乃至更穷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这是社会不和的一个源头，反而应当加以缩小，尤其要通过增加就业来实现。

先自救，然后重新出发。这就是自然给予我们的教诲。自救，也就是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作斗争，同时希望（因新冠疫情而来的）衰退的惩罚也能带来那正在消退之发展哪怕是加速的复苏的可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复苏阶段耗尽其可能性时，始终并且无论如何都是共同体意识到经济时代已经改变。

就日本而言，自 1995 年年中起，其轨迹标示的是通货紧缩，至今已持续二十多年。就美国而言，平均通货膨胀率在 2% 左右。我们记得，各中央银行把接近 2% 的价格体系水平认定为应当表明相对均衡状态的数值。而经济体系发展的均衡状态，只有在人类发展与允许我们生存之地球的发展完全中性的条件下才能达到。遗憾的是，对于因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过量而正在变暖的地球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因此，接近 2% 这一数值是一个理想值，只有当我们达到完全中性的阶段时才可能获得并保持。所以，它是一个并非计算得出而是由实践推演出来的普适数值，正如支配物理与物质规律的普适常数一样。

另一方面，还有其他普适常数在调节经济发展，首先是经济周期的自然控制、通货膨胀的加速率以及坠入通货紧缩之亚世界的过程，等等。然而，美国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坠入通货紧缩，日本却尽管有货币政策与经济政策干预的种种尝试，仍纠缠于通货紧缩的边缘地带而无法克服这一停滞。

抛开预测的优劣不谈，我们在此的兴趣是观察 2008—2010 年严重金融危机之后所遭受的通货紧缩，是如何在随后两年中被克服的。因此，核心价格指数的走势倾向于与约 2.5% 这一象征值相一致，其假设前提是该数值表明经济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

如前所述，在当前世界经济的状态下无法达到这一象征值，因为它将代表自然与处于地球上完全中性阶段之人类之间稳定而恒定的均衡状态。然而，我们可以设想，向普适常数象征值（即接近 2.5%）的收敛，仍然代表着经济体系一种潜在的美好状态，并伴随着以同一年均速度运行的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这是价格体系（因而稳定在 2.5% 左右）与被认为在同一数值上处于最优状态的可持续发展走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承认，这一“双重数值”或可成为经济正以可能的均衡水平运行的信号，等待着我们在这颗星球上的存在实现完全中性。

这样一种均衡状态似乎实质上有助于促成校准在 2.5% 的恒定增长与对自然损害最小这两种位置的重合；这是当前事态之下的最优阶段，使我们得以乐观地展望完全中性这一最终目标。而完全中性仍然是一个遥远却可以实现的目标。

四、关于货币异常问题的结论性思考

长期通货紧缩的漩涡并非不可逾越，但如果我们试图以超凯恩斯主义干预的“惯常汤药”（货币成本接近于零、流通中廉价货币过剩）来应对这一严重的货币病痛，它就会变得不可逾越。通货紧缩始终是发给共同体

的直接信息，要求其通过广泛的异议进行干预，以改变经济模式。因此必须明确，共同体是自然界唯一的中介。人类与自然体系的共同利益结合在一起，共同维护存续——不仅是人类的存续，而且是我们这个星系中生命本身的存续。这意味着，试图通过不相协调的政策去扭转共同体在经济事务上的取向是徒劳而无用的，因为与人们的希望相反，共同体的意志可能会朝更坏的方向转变。换言之，除非共同体自愿改变其负面情绪，否则任何缓和这一根本情绪的尝试都不会成功。

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建议与共同体展开讨论，共同体似乎也能够勾勒出走出经济周期与货币异常这一危险迷宫的总体基本思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回顾我们此前就以下优先需要所作的观察：必须缓和人与人之间（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在自由、经济、学校与文化方面的任何过度差别。这些前提条件对于促进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团结与人类共存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 [1] Allison G T.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 [2] 李琦. 老年人视角下成功老龄化概念的重构——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学报*, 2025(4): 27-31.
- [3] 赵琛徽, 张秀慧, 卢亮, 等. “求知共进”还是“藏知自守”: 工作中成功老龄化对代际知识转移的双刃剑影响. *南开管理评论*, 2025(12).
- [4] Baltes P B, Smith J. New frontiers in the future of aging: from successful aging of the young old to the dilemmas of the fourth age. *Gerontology*, 2003, 49(2): 123-135.
- [5] Cossiga G A. Signals from the world of economics. The price constant and the democratic iss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and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18, 3(1): 1-21.
- [6] Kose M A, Otrok C, Whiteman C H. Understanding fluctuation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9, 11(4): 1-39.
- [7] 陈志武. 金融赋能实体经济边界研究. *金融研究*, 2022(03): 1-18.
- [8] 丁业鹏, 邱卫东. “修昔底德陷阱”论的深层本质与化解路径——以中美关系为视角的分析.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 76-86.